

袁行霈 主編

國學研究文萃

考古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袁行霈 主編

國學研究文萃

考古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研究文萃·考古卷/袁行霈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301-29258-7

I. ①國… II. ①袁… III. ①社會科學—中國—文集②考古—中國—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33563 號

- | | |
|-------|--|
| 書名 | 國學研究文萃·考古卷
GUOXUE YANJIU WENCUI · KAOGU JUAN |
| 著作責任者 | 袁行霈 主編 |
| 責任編輯 | 趙新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29258-7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
| 網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dianjiwenhua@163.com |
| 電話 |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45466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經銷者 |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開本 38 印張 581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價 | 150.00 圓 |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部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謹以此書獻給
北京大學 120 周年校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

《國學研究文萃》編委會

主編：袁行霈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小甫	王邦維	李四龍	吳同瑞
高崇文	許逸民	張學智	程郁綴
蔣紹愚	榮新江	鄧小南	樓宇烈
劉玉才	閻步克	錢志熙	嚴文明

發 刊 辭

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着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衆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實生活。因此，有識之士莫不疾呼弘揚我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以輔助現代化事業——這實在是遠見卓識。

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滾滾不盡的江河，不斷納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緩，或漲或落，變動不居。國學也是這樣，漢有漢學，宋有宋學，今後則必有以今之時代命名的學派。歷史悠久的國學只有不斷以新的形態代替舊的形態，才能永葆青春。

若論國學的演進，近一百年最為急劇。1898年創立京師大學堂，1905年宣佈廢除科舉，相繼發生的這兩件事的意義，隨着歲月的推移將越來越證明其重要。這不僅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變革，也促使中國學術史掀開新的一頁。中國的學術界從此更自覺地給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留出一席之地，同時也以面向世界的新姿態審視自己數千年來固有的傳統，以建設新的學術與文化。而京師大學堂和它的後身北京大學遂成為承擔這一歷史任務的强有力的肩膀。五四運動剛過，1920年魯迅就應校長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從此，被視為“小道”的小說登上了大雅之堂，他的講義《中國小說史略》作為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為傳統的國學輸入了新的血液。中國原先雖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之類講述某一朝代儒學師承和派別的傑出著作，但沒有以近代方法編寫的中國哲學通史，有之，則始自胡適在北京大學的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清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與研究，歌謠的徵集與研究，風俗的調查與研究，都是從北大發軔的；中國最早的考古學研究室

也是在北大建立的。北京大學將一大批新的學者推上講壇，同時也把其中一些人造就成爲一代新的國學大師。正是在他們手裏，古老的國學呈現出新的氣派。北京大學於是也奠定了自己在學術界無可爭議的崇高地位。

近半個世紀，“國學”這個詞雖然罕用了，但仍有許多國學研究者在辛勤地耕耘着。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因爲有了日趨良好的生態環境，國學研究遂亦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綿延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不會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偉大的中華民族不會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樣。植根於中華大地的國學，必將抖落身上的塵埃，吸取各國優秀文化的營養，以其扶疏的枝葉向全世界展現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國人民也會更加珍視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吸取對他們有用的精華，以豐富他們自己。今後，北京大學的學者將一如既往作出應有的歷史性的貢獻。

有鑒於是，我們創辦這份《國學研究》！

袁行霈

1992年6月1日

目 錄

發刊辭	袁行霈(1)
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	嚴文明(1)
中國環濠聚落的演變	嚴文明(26)
中國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及其成因	王幼平(35)
中國古代禮制文明的考古學觀察	高崇文(53)
中國北方的史前石鏃	趙 輝(111)
沙井文化研究	李水城(144)
黃銅冶煉工藝在中國的產生與發展	周衛榮(174)
新疆青銅時代諸文化的比較研究	
——附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	水 濤(190)
湯都垣亳說考辨	鄒 衡(233)
召公奭、燕國始封及相關史事的考察	孫慶偉(255)
周代棺槨多重制度研究	趙化成(276)
峽江地區的先秦文化	孫 華(320)
圍棋與中國文化	齊東方(351)
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	李家浩(375)
秦漢帝陵陵寢制度探討	高崇文(404)
永固陵與北魏政治	沈睿文(439)
內蒙古土默川、大青山的北魏鎮戍遺迹	蘇 哲(459)
吐火羅神祇考	林梅村(478)

阿里地區札達縣境的寺院遺迹

——《古格王國建築遺址》和《古格故城》中

部分寺院的有關資料讀後……………宿 白(502)

西藏寺廟建築分期試論

——西藏寺廟調查記之六……………宿 白(547)

北京紫禁城在規劃設計上的繼承與發展……………侯仁之(578)

火之爲藥

——《本草綱目·火部》考證……………李建民(588)

後 記……………(604)

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

嚴文明

一 爲什麼要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

重建早期中國歷史的任務不是現在才提出來的。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爲了打破封建的史學體系，一些學者對先秦史籍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考辨，覺得很不可靠，必須推倒重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現在總算有了初步的結果，若是要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則還需要進行長期的努力。爲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首先要瞭解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是什麼。

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 中國很早就有編寫史書的傳統，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有一些官修或半官修的史書問世。其中有些是紀年體，有些則記述帝王譜系，追溯較遠的多是從黃帝開始。最早提出古帝王譜系的當爲《世本》中的《帝繫》篇。《漢書·藝文志》載：“《世本》，十五篇。”班固解釋說，《世本》是“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書中除《帝繫》外，還有《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居篇》和《謚法》等篇，古書多有引用，可惜到宋代就失傳了^①。其中《帝繫》篇又曾收入《大戴禮記》中。二書文本基本相同而略有出入。《大戴禮記》敘述商人先祖世系至契爲止，周人先祖世系至稷爲止；《世本》則多了契子昭明至天乙湯，稷子不窋至文王。關於楚人先世的說法也不盡相同。古本《竹書紀年》的帝王譜系也是從黃帝算起的，繼而敘述夏商周直到戰國魏襄王時爲止的歷史。而此書即出於魏襄王的墓中，是一部紀年體的通史，只是文句簡略。相比之下，《帝繫》僅寫到春秋，似乎成文比《紀

嚴文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載《國學研究》第26卷，2010年12月。

年》要早^②。成書於戰國早期的《國語》和《左傳》講述古史也多從黃帝說起，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共識，所以後來司馬遷寫《史記·五帝本紀》也是從黃帝講起的。

一些史書把古代比較著名的領袖人物稱為帝某或某帝。例如黃帝、炎帝、帝堯、帝舜之類。帝的本義是禘祭，首先是對神的祭祀，跟着就有對已故首領的祭祀。被祭的神稱為某帝，被祭的人王也可稱為某帝。以黃帝為始祖的譜系中也有不少是沒有帝名的，他們是不是當過首領不得而知。到了戰國五行說盛行，一些學者往往把自認為最有名或最有影響的帝找出五位而稱為五帝。《孔子家語·五帝》假託孔子答季康子問時說：“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是為五帝，其名稱為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的《天文》和《時則》等也有同樣的說法，但此說影響不大。

較早出現的五帝排序見於《國語·魯語》，其中寫道：“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大戴禮記·五帝德》假託宰我問孔子五帝的事，排序就是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這是最有影響的一種五帝說。《呂氏春秋》的《古樂》和《尊師》兩篇也引用此說。到《史記·五帝本紀》引用此說後便成為最權威的一種說法。

還有別的五帝說。例如《戰國策·趙策》《易·繫辭下》和《莊子·繕性》等便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偽古文《尚書》序則以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甚至到王莽和蕭梁時期又各排出了新的五帝。主要因為《史記》的權威，《五帝本紀》所排定的五帝為大多數人所尊重。其中所述五帝的事迹基本上是照抄《五帝德》和《帝繫》。

在戰國時代還有所謂三皇的說法，據說那是比五帝時代更早的一個時代。有各種各樣的三皇，但沒有一種說法具有權威性，內容也更加虛無縹緲，所以司馬遷沒有採用。《史記》之後，歷代都有官修的史書，也都依照司馬遷所定的古史體系，這就是傳統的中國古代歷史的系統。可是有些人覺得中國歷史應該比五帝更早，起碼要追溯到所謂三皇的時代。到唐代司馬貞作《史記索隱》時，乾脆在前面加了一個《史記補》，叫作《三皇本紀》，可謂畫蛇添足，受到一

些人的批評。

其實司馬遷也是很無奈的。他明明知道有些記載是不可靠的,有些記載是矛盾的,却要想法子捏合到一起。他在《史記》卷十三的《三代世表》中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這些話講得多麼好!說明他對於古代歷史的傳說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可是他對於那些傳說捨不得割愛,緊接着就說“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我們把他所製世表加以簡明化,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之處。例如《五帝本紀》根據《尚書·堯典》說堯把天子位傳給舜,舜又傳給禹。可是表中這三個人都是黃帝的後裔,而堯和禹是同輩,都比舜長四輩,怎麼能說得通呢?^③至於夏商周先人的世次矛盾就更大了。顯然司馬遷的本意還是“疑則傳疑”,並沒有把它看成是真實的信史。

黃帝	昌意→顓頊	窮蟬→敬康→句望→蟜牛→瞽叟→帝舜(重華)
		鯀→禹(文命)→啓→太康→仲康→下傳十四世至桀
	玄囂→蟜極→帝嚳	帝堯(放勳)
		契→昭明→相土→下傳十一世至湯→再傳十六世至紂 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下傳十一世至武王

對傳統古史系統的質疑 很早就有人對《帝繫》和司馬遷《三代世表》所擬定的古史系統提出質疑。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在《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圖序》中說:“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

歐陽修主要是說世表中世次的紊亂達到了荒謬的程度,更為荒謬的是表中把不同族系的人硬派上血親關係,說他們都是黃帝的子孫,黃帝就成了千古

一系的人文初祖。封建史學體系的核心就是以帝王爲中心，帝系和世表正是以帝王爲中心的歷史觀的代表作。其實商王的始祖契和周王的始祖稷都是知母而不知父的，有點像母系氏族社會的情形。夏后的先祖也只能上推到鯀。這些情況司馬遷是知道的。他在《殷本紀》一開頭就說：“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詩·商頌·玄鳥》開頭也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周本紀》開頭就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大雅·生民》開頭也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這裏都說得清清楚楚。可是這位太史公覺得契和稷不能沒有父親，於是按照《帝繫》的說法，硬說簡狄“爲帝嚳次妃”，說“姜嫄爲帝嚳元妃”，殷人的始祖契和周人的始祖稷這兩位毫不相干的人物便變成了同父異母兄弟，自然也都成了黃帝的裔孫！這樣編排的古史系統怎麼能令人相信呢？

對於《帝繫》和司馬遷等確立的古史系統提出質疑的不止一人，清代的閻若璩和崔述等就曾經作過詳細的辨正工作。到 20 世紀初年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顧頡剛爲首的一批學者以《古史辨》爲陣地，做了大量考辨古史的工作。誠如顧先生自己所說：“以考證方式發現新事實，推倒僞史書，自宋至清不斷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這是實話，也是謙辭。他們比以前的學者站得更高，方法更科學，而且目標明確，就是要徹底推倒兩千多年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統，作爲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是推倒了舊有的古史體系，真正的中國古代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顧頡剛曾經明確地指出，應該借重考古學來重建中國的古代史^④，這是很有見地的，儘管他自己並不從事考古學研究。

但是在近代考古學開展以前，有一件事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就是商代甲骨文的發現和被確認。

二 甲骨文研究的貢獻

1899 年時任清代光緒朝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發現中藥的所謂“龍骨”實

實際上是古代的龜甲片，上面有刻畫的文字，於是委託古董商購買更多的有字甲骨，認出其中有祖乙、祖辛等商王名號，斷定是殷商遺物。之後各家競相收藏和進行研究，成績卓著。王國維 1917 年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⑤，接着又發表《續考》和《殷周制度論》等宏文，影響頗大。他用二重證據法證明《史記》中的《殷本紀》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確的。而《史記·殷本紀》主要是根據《世本》的《帝繫》篇。由此看來，《帝繫》所記也應該有它的根據，不能因為前面談到的一些自相矛盾之處而一概否定。

至今殷代的甲骨文已經發現 15 萬片之多。王國維之後經過董作賓、郭沫若、陳夢家和胡厚宣等許多著名學者的研究，對於商代社會歷史的方方面面已經有了相當詳細的瞭解，只要看看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⑥、由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就會明白^⑦，現在殷代的歷史已經成為信史。至於殷代以前的歷史，根據甲骨文的研究也可以獲得不少信息和有益的啓示。因為商代王室實行周祭，不僅祭祀商湯以下諸先王，還要祭祀湯以前的所謂先公。因此甲骨文中就有從始祖契以來諸先公的名號，排列的順序跟《帝繫》和《殷本紀》基本相同。這個商先公譜系的確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先公所處的年代適當夏朝的年代。按照《帝繫》和《史記·夏本紀》，夏朝自禹至桀共十六世，商先公自契至湯是十三世。每世的年數總是或短或長，十六世和十三世的年數便有可能是相當的。商先公時期曾經有八次遷徙，是很不穩定的，其譜系還能傳到春秋戰國之世而沒有發生大的錯誤。夏朝雖然一開始也有些不穩定，但自少康以後就相當鞏固了，國力遠比先商的小朝廷要強。先秦古籍中常常徵引《夏書》，不管是夏代的書還是夏朝後人追溯歷史所寫的書，都說明直到春秋戰國時還是有人多少瞭解夏朝的歷史。所以孔子才說要“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還說“夏禮吾能言之”，同“殷禮吾能言之”（《論語·八佾》）相並列。雖然感到“文獻不足”，却並非全然不知。由此可知《帝繫》和《夏本紀》所載夏朝世系是有一定根據，說契曾經佐禹治水也不是沒有可能。有些學者因為沒有發現夏朝的文書而懷疑夏朝的存在是大可不必。

三 考古學家的追求

中國考古學家一開始就肩負着重建早期中國歷史的使命，而早期甲骨文

的研究直接引發對安陽殷墟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考古發掘。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組，主要工作就是發掘殷墟遺址。從1928年至1937年連續進行了15次發掘，發現了商代晚期成組的宮殿宗廟基址、巨大的王室陵墓、大量的窖穴、祭祀坑和殉人、殉牲等遺迹，其中的H127甲骨文坑出土刻有文字的甲骨一萬七千多片，不啻為一座商代卜辭的大型檔案庫。至於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玉石器、骨器、蚌器和象牙雕刻等更是不計其數，為此發表了大批田野考古報告和研究著作，商代晚期的歷史由此大大豐富起來。但作為一個都城遺址還有許多問題有待釐清，所以從195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時起即恢復了殷墟的發掘，除“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幾年，一直持續至今。一般認為殷墟是盤庚遷殷以後直到末代紂王的都城，證實了《古本竹書紀年》中“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說法^⑧。近年來在殷墟東北發現了一座巨大的洹北商城，年代略早於以小屯為中心的殷墟，或謂那就是盤庚遷殷始建的都城，而小屯殷墟則為武丁以後的都城^⑨，這是後話。盤庚以前的都城究竟在哪裏，自然成為考古學家關注的焦點。

1950年，在河南鄭州發現一處可能屬於商代的遺址，1952—1955年陸續發掘了製銅、製骨和製陶的手工業作坊遺址，並且發現了早於殷墟晚商文化的地層關係。當時即有學者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早於殷墟的都城遺址，並推測可能是仲丁所都之隰^⑩。後來的發現越來越多，特別是發現了略呈長方形的城垣遺迹，城內面積約3平方公里，東北部有宮殿遺迹群，還有給排水系統和大型青銅器的窖藏等。後來又發現了規模更大的外郭城^⑪，從而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在分析鄭州商文化遺存時，人們發現其建都年代應該在商代初期，於是提出了所謂鄭亳說^⑫。到1983年又在洛陽附近發現了偃師商城，其始建年代同鄭州一樣早。學者多認為它應該是古文獻上所說的西亳。兩個亳都是什麼關係，成為學者們探討的新課題。

進一步的問題，自然是尋找夏文化和重建夏代的歷史了。

四 夏代歷史的探索

根據歷史記載，大約在公元前兩千多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夏

誕生了。夏代究竟應該從大禹算起還是從他的兒子夏啓算起，學術界雖有不同的看法，却無關宏旨。按照古本《竹書紀年》的說法，啓曾經同益爭奪王位，把益殺了。又曾經與有扈氏打了一大仗，政權還沒有穩固，到他的兒子太康時就被東夷有窮國的后羿推翻了。後來羿又被寒浞推翻，等到太康的重孫少康在別人的幫助下才得以復國，史稱“少康中興”，夏朝的統治才穩固下來，在考古上要把這一段歷史弄清楚是十分困難的。用已知推未知的方法，還是應該從早商文化往前推，把夏代晚期的遺存找出來，再來探討早期夏文化的問題。

距離河南偃師商城以西約 6 公里有一個二里頭遺址，那是著名的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 1959 年為尋找夏墟而發現的。遺址規模之大和遺物之豐富讓徐先生特別關注，認為那應該是一個都城級的遺址。可是徐先生並沒有把它判斷為夏墟，而推測“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⑬。那個遺址現存約 300 萬平方米。由於遺址的北邊被洛河沖毀了一部分，估計原先應該有 400 萬平方米^⑭。發現有多處宮殿遺迹，其中 1 號宮殿基址就有一萬平方米，上面有宮殿、門廳和迴廊，中間是一個大庭院。二號宮殿略小，但結構更加規整。前不久又新發現了幾座宮殿基址。所有宮殿都是坐北朝南，方向一致。圍遶宮殿有道路和城牆，城內面積達 10 多萬平方米，明顯是一座宮城。照理外面還應該有更大的城圈，也就是王城的城牆，可惜至今沒有找到。不過既然有這麼大的宮殿和宮城，自然應該是王都所在。二里頭遺址可以分為四期，宮殿主要在二、三期，延續使用至四期之末。一期雖然沒有發現宮殿，但一些迹象表明其規格不同一般。出土物中有稀有的白陶、象牙器和綠松石製品等，還有青銅工具，這些都不是一般聚落所可能有的。從一開始就有這種規模和規格，應該是有計劃建設的都城。只是由於後期的破壞比較嚴重，整個布局還不大清楚。

二里頭遺址除宮殿外，還有面積達 1 萬平方米的銅器作坊遺址。在一些中小貴族墓中出土的青銅器有鼎、斚、爵、盃、鈴等禮樂器，戈、鉞、戚、鏃等兵器，鏃、鑿、鑽、錐、刀和魚鈎等工具，還有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等。從銅器作坊遺址中出土的鑄銅陶範來看應該還有更多更大的器物。可以說在後來商周時期各主要類別的青銅器在此時都已初具規模，從而開啓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先河。二里頭宮城外的道路上還遺留有雙輪車的車轍痕迹，這一發現與所謂夏代奚仲造車的傳说不謀而合。

二里頭一期到四期的文化發展是連續的,第四期之後突然衰敗,此時正是偃師商城興建之時。許多學者認為這一興一衰,正是夏商王朝更迭最直接的物證,是劃分夏商兩代之間最好的界標。結合兩者文化特徵的比較分析,推測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代的王都,是中國第一個世襲王朝的都城。不過二里頭遺址的年代,據碳-14 方法測定,大約在公元前 19 世紀中葉至前 16 世紀中葉,前後只有 300 年左右^⑮,最多只相當於從少康中興直到最後一位帝王夏桀的時期。

至於夏代早期的都城,由於那時政局的不穩定性,要在考古遺存上找到確切的證據頗不容易。不過最近找到的一些線索,也許為進一步的探尋提供了一線希望。一個是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屬於中原龍山文化的晚期。有大城和小城,大城至少有 30 萬平方米,其中有多處用人牲奠基的情況。旁邊的東周城址出土多個有“陽城倉記”戳印的陶器殘片,所以發掘者認為王城崗就是傳說中“禹居陽城”的那個地方。碳-14 測年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也與夏代早期的年代基本相合^⑯。另一個是河南新密市的新寨遺址,那裏也有一座 30 萬平方米的屬於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在稍晚的新寨期又包着龍山文化的城址築城。在後者城內有大型建築基址,遺物中可以看出不少東方的因素^⑰。所以有的學者推測它可能是后羿代夏時期的都城。這兩個地方的考古工作都還僅僅是個開始,是否真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當然還需要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應該強調的是夏王朝並不是孤立的,和夏王朝同時還有其他國家或王朝,只是夏王朝的勢力最強,文化先進,因而影響也最大。從《殷本紀》和甲骨文所見商先公的世系和事迹來看,那時的商人也建立了一個與夏王朝並立的世襲王朝。過去以為商的先人起自東方的山東一帶,現在看來並不正確。真正代表商先公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應該是所謂漳河型的先商文化,這是從文化特徵的比較分析中得出的結論。它分佈於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與代表夏的二里頭文化相鄰,只是至今還沒有發現一處先商的都城遺址。最近在河南濮陽戚城發現一處龍山時期的城址,是否與商人早期的活動有關,值得注意。與夏朝發生關係較多的是東夷。近年在山東、河南東部和江蘇北部發現的岳石文化已被證明是夏代至商代初期的東夷的文化,它是繼承山東龍山文